

电视万花筒

郭平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

PDG

献给——我们的祖国和师长们！

柳春江 李连江 任耀坤
刘敬英 刘敬英
苏玉成 苏玉成
王桂平 王桂平 陈国平
王强 王强
刘惠东 刘惠东
刘进东 刘进东
李桂莲 李桂莲
叶建纯 叶建纯



写在前面的话

“万花筒”的确是一种很奇特的玩具——一个纸筒，几片镜片、一把碎玻璃，竟幻化出一个五光十色、神秘莫测的世界。比起时下时髦的遥控汽车和“变形金刚”来，它的确简单得近乎寒怆，然而，在这简单之中，似乎却透露出几分灵气。它普通，但看上却魅力十足；它单纯，但使人感到的却是捉摸不透；它浅陋，但却好象具有深邃的意境。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效应——一些普普通通的物质，被放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，它向人们展示的已不再是物质本身，而是一个复杂而又含蓄的世界。

我们这些人何尝不是这样！

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们聚合在了一起——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七七摄影班。在我们这三十一个人当中，最大的二十七岁，最小的只有十七岁；有的人已有十几年的工龄，有的刚刚迈出高中的校门；有的人曾经是管过几千人的地方官，有的却从未离开过父母一步……这是一个奇特的组合，一个只有在一九七七年才有可能出现的组合。

记得十一年前，当我们刚刚踏进校门的时候，我们的脸上很少有惊喜的表情。因为，我们似乎从来就不会笑。十年的风风雨雨造就了这样一些奇特的人：他们十几岁就走出家

DAB6/62

门，被推进一个无边无沿、无亲无故的“广阔天地”。在这个天地里，工农商学兵，他们什么都干过；酸甜苦辣咸，他们什么都尝过；悲欢离合，他们什么事都经历过；三教九流，他们什么人都接触过……以至于当他们迈进大学校门时，表现出来的竟是出奇的平静。

今天的大学生大概不能理解我们。我们从来没有误过一节那怕是最枯燥的课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考试时看一下别人写了些什么，我们没有一天不去图书馆，甚至，我们恭恭敬敬地对那些比我们年龄小得多的人叫“老师”。因为，我们耽误的太多了。

在这出奇的平静中，我们也显得有些不安份。一九七八年冬天的西单大街曾经留下过我们的身影，北大的竞选运动曾经出现在我们的作业中，一篇《喇叭裤礼赞》曾经惊动过整个校园，甚至，我们也曾经为吃饭排队而大打出手……奇怪吗？“人”这个最简单的字，本来就像万花筒那样五光十色，神秘莫测。

记得七年前，我们即将离开校门的时候，我们的确欢笑了。在密云水库的大坝上，我们为四年的友谊干杯，为老师们的辛劳干杯，也为我们自己的成绩干杯——我们曾经是先进班集体，曾经连续夺得校运动会的冠军，我们的文章曾发表在杂志上，我们的照片曾经出现在“全国影展”上，我们的影片也曾在电视中播出……。

今天，我们分散到了全国各地，成了电视行业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。在我们当中，有16人成为电视台内一个部的领导者。几乎每个人都有获过奖的作品。在我们当中，有的人统帅过采访组去报道汉城奥运会，有的人与日本人合作拍

过大黄河……当然，也有一位，只有在劳改所的档案里才能找到他的确切地址。奇怪吗？“生活”这个最普通的用语，本来就象“万花筒”那样五光十色、神秘莫测。

同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使我们拿起笔来作这次精神的聚会。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一天，几位同学在北京相遇。席间谈到毕业后几年各自的经历，谈起当记者的甘苦和电视工作的是与非，不免有些忘乎所以。有人提议，我们是否能够组织全班的每个同学来一次“笔会”，一则，给三十年校庆留一点纪念，再则，也算是大家分别七年后的一次团聚。于是，这样一本没有明确主题，没有统一内容，没有高深理论的小书诞生了。但是，有一点却是不可缺少的，那就是——我们的性格与心声。

在这些文章中，我们又看到了七年前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：老成持重的还是那么老成持重，锋芒毕露的还是那么锋芒毕露，故作深沉的还是那么故作深沉，诙谐俏皮的还是那么诙谐俏皮。只不过多了几分老练，多了几分清醒与冷峻。

在这些文章中，我们又看到了七年前七七摄影班的影子：朴素而不贫乏，强壮而不粗鲁，有情趣而不炫耀才华，敢直言而不忘乎所以。

当然，我们并不想仅仅表现自己，还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一行。电视，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不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了，但是，这个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方匣子却也是一个五光十色，神秘莫测的世界。当人们被一场精彩的体育转播所吸引时，大概不知道这中间有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；当人们为记者扛着摄像机大出风头而感到羡慕时，大概也不知道为了一个节目，记者遇到了多少困难和艰辛；人们大概不知道，节

目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戏外“戏”，大概也不知道，电视台原来是一个大千世界中的“小千世界”……这本书，或许能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到这些。

了解电视不容易，参与电视工作更不容易，那么，能够在电视工作中自尊自重、有所作为就越发的不容易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七年多时间，使我们的确加入到“越发不容易”的行列中，尽管我们看上去还是那么单纯、普通，甚至“浅陋”。

我们把这本书取名为《电视万花筒》，是想让人们从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写的普普通通的文字中，发现一种奇特的效应——一些普普通通的物质，被放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，它向人们展示的已不再是物质本身，而是一个复杂而含蓄的世界。

目 录

电视·轮廓光

马国力	体育·电视·报道权	(1)
余义宁	为了使世界变得更“小”些	(15)
温化平	令人羡慕的职业	(23)
岑传理	体育比赛的全方位报道	(29)
程鹤麟	黑色的诱惑	(45)
胡立德	电视立体报道的特性	(54)
韩国强	关于改进电视新闻的几点思考	(61)
田 广	电子录像与民族学	(66)

创作·深焦距

钟大年	让“人”成为主角	(75)
程鹤麟	我和《新闻半小时》	(92)
乔保平	举办《社会之窗》专栏有感	(100)
王桂华	屏幕外的话	(106)
刘新荣	电视新闻杂谈	(122)
鲁 伟	批评报道和由此而想到的新闻改革	(129)
段晓明	谈谈旅游片的摄制	(137)
温化平	情况与问题	(141)

往事·摇镜头

- 柳春江 驻站记者的甜酸苦辣 (148)
张旭童 “卡利波索号”上的二十天 (158)
高燕文 兴隆一月 (170)

海外·广角镜

- 刘惠东 致学友的一封信 (192)
钟大年 ARD新闻中心的一天 (194)
马国力 “德国老乡” (202)
任金州 美国电视圈内的所见所闻所想 (211)
最后的话 (230)

马国力，男，1953年出生。入学前曾参军5年，从事航空摄影工作，毕业后分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部，现任体育部副主任，

他制作的1986年《新春体育晚会》使普通人第一次在中国屏幕上成了体育明星一样的明星。《北京体育风情画》、《云南体育风情画》别出心裁地让观众看到了自己身边的生活。他还作为报道组负责人之一，出色地完成了汉城奥运会的报道任务。尽管现在已是体育部副主任，但他仍挂心于他所开创的《体育新闻》节目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原来老于事故的他，却变得越来越热爱生活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摄像机把我导向真正的人生。”

体育·电视·报导权

马国力

自打电视问世，这个方方正正的“魔匣子”着实毁了不少人，以致海内外许多文人学者、贵族名流在沙龙里以“我从不看那玩艺儿”而标榜清高。不过通过这大大小小的荧光

屏、却也造就了更多的风流人物。演员、歌星暂可放入“凡人”之列，但连那道貌岸然的政治家、商人、慈善家也都要靠电视来抬高身价，因为“不看电视者”虽然高雅脱俗，但却少数，而大多数人都只属于“芸芸众生”这个圈子，还愿意生活在这个“俗世界”里。他们要通过电视去看别人怎样表现，也想通过电视来表现他们自己。

人们大概还记得88年美国大选，和往年一样，又是一场电视大演出。现任总统布什差一点败在了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手下，但在投票前的两个月内，突然变劣势为优势，最后入主白宫。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改变了自己在电视中的形象。在一些国家中，常常有些人被莫名其妙地推成国家首脑，而在美国，则是电视向公众推销总统。冷眼看去，那个民族的确有些幼稚，凭着个人的风度和机敏就能拉到选票。但仔细想来，能看看听听，却也总比看不到听不到就画圈要好那么一点。

这多年来，哪些人通过电视获取了最大利益呢？广告商要名列首位。在我国的电视中刚刚开始出现广告时，“日立宝宝”就爬上了荧幕，从此，日本电器像钱塘江大潮，冲开了刚刚打开一条小缝的中国市场大门，甚至抹掉了人们“八年抗战”的痛苦记忆。“日立牌是Hitach”连三岁的娃娃都会唱。在这场洪水中，谁统计过日本的大亨、小亨从中国捞走了多少条大鱼、小鱼和虾米？

在电视创造的“暴发户”行列里，排在第二位的大概要数运动员，当然得是名运动员。一个国家的部长、总理在观众脑子中留下的印象绝对没有体育明星来得深。前两年风传有人鼓动球王贝利去竞选巴西总统，假如他真的干了，从他的

名气来讲，谁也不可小嘘。幸亏他没干，虽然地球已经在他的脚下，但用踢球的技术来治理国家，恐怕脚下的这块土地非得塌下去不可。

88年初，我和体育评论员宋世雄一道去云南边境采访，那里的一位宾馆经理对老宋说了一句：“宋老师，您在这里可比小平同志还著名呢！”吓得老宋连连摆手：“可不能这么说！可不能这么说！”这位经理当然有点讨好之嫌，但却也说明了运动员在观众中的地位，爱屋及乌，连解说员也都捎上了。这些名气从何而来的呢？电视。

有名就有利，这一点在商品社会中尤为突出，网球巨星伦德尔身上的广告论公分卖，两平方厘米的位置要上百万美元！他真的值那么多？其实是电视帮了他，广告商看上的不是他身上的那块位置，而是屏幕上的他。按全世界有五亿电视机计算，伦德尔身上的两平方厘米加起来就是十万平方米，差不多一座中央电视台。当然不能这么计算，但这么算是不是可以加深一下人们的印象呢？

说到这里，我们言归正传。第一段叫做：

体育电视化

在我国体育界、新闻界由于汉城奥运会的失意而把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转为“体育就是体育”的时候，国际体育界却正在失去它的纯洁。体育固然是体育，但它又从来不仅仅是体育。电视出现之后，它的旁属效应就更被突出了。它既是高尚的政治，又是肮脏的金钱；既代表着国家的利益，又标志着个人的等级。

对于大多数我国国民来说，“带色儿”的画面是在80年代才被认识的。而第一次通过卫星来转播体育比赛只是10年

前的事情。在这10年里，电视是我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一项事业。

1980年，华国锋和里根一起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，我国零的突破被推迟了4年。没有体育代表团，没有电视采访团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，第22届奥运会似乎并不存在。

1984，洛杉矶给中国观众的感觉可就不一样了，他们看到了挂在中国运动员脖上的金牌，同时也看到了另外一片世界。

好莱坞的导演是世界之最，这一点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人们还记得那几百架钢琴奏出的欢乐颂，还记得由几千人表演的移民历史，还记得那个只用一个火箭就从天而降的奇人。这一切，仅仅是为了坐在防弹包厢中的里根，为了手拿各国国旗的几万名观众？导演最后对画面负责，洛杉矶的演出也正是为那些观看画面的人们。

1988年，人类体育史在汉城这个颇有争议的地方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尽管有着政治上的隔阂，但任们一个角落的观众都不得不承认，这确是一次成功的大团聚。有人说：第24届奥运会的主题歌“手拉手”成为了88年世界第一流行歌曲。这种说法可能会遭到不少唱片商的非议，但就听到它的人数而论，的确是创造了第一。中央电视台在89年一月份还把他做为奥运回顾节目的首席而大加宣扬。国际通讯卫星把开幕式的画面送到了几十亿观众的眼前，“手拉手”的旋律的确像作者希望的那样超越了政治、人种、阶级和国家的障碍。

在大型国际赛场上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主席台两侧的最好位置上摆放着一排排监视器和话筒，这里是电

视评论员的天下。没有一个主办者为失去这些位置的票房收入而后悔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坐在那里的“电视人”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和不可计数的社会影响。

电视是一种大众转播的媒介，一种被动的载体。但由于它负载的质与量的影响，成为了一种主动干涉力量。它可以默默无声地把真实的生活传送给观众，而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感人至深的场面。看过汉城奥运会田径转播的人，大概不会忘记男子马拉松冠军到达终点时跪下来亲吻大地的镜头。电视可以使人们感受到运动员的喜悦和悲哀，此时此刻，它用不着说话。然而它也大喊大叫地推销着某种东西，“强暴”地引导着人们的欣赏习惯和喜好目标。在十五、六年前，欧洲人视美国橄榄球队员为太空来客，但由于后来每一周一至两次的电视节目，现在欧洲的孩子们也以穿这种“太空服”为时髦了。排球在我国不是什么稀罕运动，但随着81年中央电视台对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大量、集中的报道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“排球热”。有趣的是，现在男排，女排都有点不景气，中央电视台由于经费所限，只能把外汇投放到热点项目上。于是排球转播少了，打排球的人数也马上减了下去。

台球也是如此，87、88两年，中央电视台转播了两次世界台球精英赛。我们并没有推广台球的意思，因为实际上中国社会还不太适宜摆放台球桌。我们的目的是给电视台赚上一票，转上几场，中央电视台可以从英美烟草公司那里得到几万美元制作费。88年夏天，北京掀起了一阵台球热，好象一夜之间街头就出现了几百张球台。就象许多西方来的东西都变了味一样，本该着夜礼服的绅士变成了穿裤衩的小伙儿，

还捎带着赌博、骂人和打架。公安局的一位同志说了一句：“一方面是我们取缔街头台球，另一方面电视台里又播着台球节目。”就和前几年有人把青少年犯罪拉到《加里森敢死队》一起一样。当个“电视人”也真不容易。

然而还得干，尤其是体育节目，总得播点儿观众没看过的。人们学得也快，播了横穿美国的自行车赛，就有人骑着自行车周游全球；播了巴黎——达喀尔汽车拉力赛，就有了香港——北京，丝绸之路，乃至巴黎——北京的竞赛路段，而且有的单位已经着手准备一号方程式汽车场地赛了；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受到阿拉斯加狗拉雪橇比赛的启发，而准备在东北也开辟一条线路？

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电视还只是转播着比赛的信息，那么现在它已经在干预着比赛本身了。1985年美国的英比尔石油公司开始举办世界田径大奖赛，每年只进行十个项目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电视转播。比赛可以在3小时之内结束，这是各国电视台可以接受的直播长度。这种干预在汉城奥运会上更为突出，美国NBC广播公司出资3亿美元购买了报道权，但条件是要改变一些比赛的时间，以适应美国观众的收看习惯。拳击、田径等项目的运动员要早早爬起来决赛，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。尽管这个要求得到了各方面的抗议，国际田径联合会甚至声言抵制，但是最终的胜利者却仍然是电视。为了美国，为了电视，运动员们只好委曲一点儿了。

人总是这样，当他没有某物的时候，还可以忍受，但当他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时，则会感到巨大的痛苦。人们有过10多届没有电视转播的奥运会，但现在假如没有了电视，全世界的球迷会有什么感受，主办者会是多么艰难，运动员又会

是多么寂寞。社会发展到了今天，可以说，没有电视就不再会有奥林匹克。

电视已经把全世界缩小到了一块屏幕上，全球的歌星们已经通过电视在各自的家门口进行了环球演出，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：各国的体育明星们在各自的场地上进行全球抗争，电视是他们之间的桥梁。

电视把体育推向了空前的繁荣，而电视最终又受到了体育的惩罚，这就是第二段的题目：

电视金钱化

凡被惩罚的人总是有他自身的过失。电视把体育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，但它这样做的目的也并不纯洁。商品社会发展到今日，世界上大概找不出几家电视台，转播体育比赛是纯而又纯地为了体育事业，为了观众爱好，它总要得到一些东西，非名即利。在美国，奥运会期间的广告每30秒钟价值10万、20万以致30万美元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电视的生存需要大量的金钱。然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，体育比赛的主办部门也要分一杯羹。于是在这十几年间，电视台一次次自愿地和被迫地吞咽下自己酿造的苦酒。

根据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基拉宁的回忆，在60年代以前，国际奥委会是一个资金很拮据的组织，当选为委员的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前提，即可以自付旅费。而88年在汉城时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可说是今非昔比了。这里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出自电视。

1960年，第17届奥运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，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购买了报道权，出资55万美元。它算是最幸运的，它的两大对手ABC和NBC在以后连想也没敢想过只出

这么一点点钱。

1972年，慕尼黑奥运会、美国ABC公司花费750万美元；

1976年，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北美报道权以2500万美元成交；

1980年，虽然中美等国抵制，但与莫斯科奥运会组委会早已签约的美国NBC广播公司照样不是掏了8700万美元；

到了1984年，奥运会移到了美国。同胞之间没有丝毫照顾，反之“宰”得更狠。ABC公司以两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和龙伯罗斯成交。从60年到84年，24个春秋，电视报道权涨了四百多倍。

对于电视台来讲，奥运会的主办者是越来越“黑”了。在88年汉城奥运会的报道权谈判时，南朝鲜方面提出的第一数额是七亿美元！真可谓漫天要价。经过反复的谈判，最后NBC公司同意付出三亿美元。在这张协议书里还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美方的，既要改变一些项目的比赛时间，否则价格减少一亿美元；另外一个是汉城的，如果NBC的广告收入超过四亿美元，超出的部分要和汉城组委会分成。

人们可能会注意到：谈起奥运会报道权，焦点总集中在两个方面——奥运会组委会和美国的一家公司，NBC、ABC或是CBS。虽然在每次奥运会上总会看到百十个电视组织，但和美国佬相比，这些其它电视台所出的费用就是微不足道的了。在汉城，日本是报道权的第二大买主，不过出了5200万美元；而整个欧洲广播联盟，几十个电视台总共才用了2800万美元，谈起来有点不公平，因为欧洲的产值、人口、电视机数量都远远超过美国，这原因何在呢？

美国的各个电视台都是私人所有，而不像欧洲、日本的大型电视台那样，或是国有，（国家拨款），或是社会所有（收取收看费）。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，而广告收入则取决于收视率，提高收视率是美国电视制作人员的第一标准。而在体育节目中，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无疑是最有利可图的，可以通过把广告插播在最精彩比赛的前后，以利高额收费。即使在这次转播中入不敷出，但随之而来的知名度的提高也可以使本台的收视率上升一点，哪怕是百分之一，在美国，一个百分点代表着几千万美元。

另外美国是一个完全的商品经济社会，商品经济的第一大特点是自由竞争。公司、企业可以互相兼并，但有一个限度——不能垄断价格。假如三家公司联合购买奥运会报道权，当然可以压低价格，但这却违反反托拉斯法。而且，在这些从小就受到自由竞争意识教育的“山姆大叔”眼里，这样的联合是不可想像的，NBC、ABC和CBS三大公司之间唯有竞争。局外人看准了这个空子，心里暗暗使劲：“不宰你美国佬还宰谁！”

虽然美国的自由竞争受到人们的尊重，但各国的电视组织却也深受其害。水涨船高，美国报道的底数越来越大，其它电视台的绝对数虽少，但相对值却也在翻番。我国中央电视台在84年花10万美元购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报道权，在88年则付出了26万美元。为92年巴塞罗那大概要花上40来万。这对于一年外汇预算不过几十万美元的中央电视台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

不仅仅是价格，美国公司的竞争做法也引出不少麻烦。早在1986年，香港无线电视台和亚洲广播联盟一起联合购买